

七大洲风云四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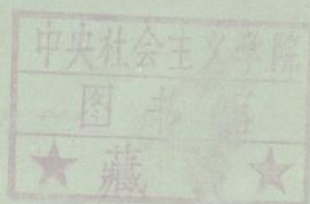
上

〔美〕赛·利·苏兹贝格

QIDAZHOU

FENGYUN

SISHINIAN



K15/1

011177

七大洲风云四十年

——回忆录萃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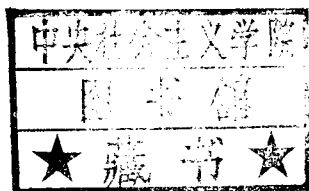
上册

〔美〕赛·利·苏兹贝格 著

蒋敬、米瑞恒、梁再宏、龙校 译



200305446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6/07

C. L. Sulzberger

SEVEN CONTINENTS AND FORTY YEARS

A Concentration of Memoirs

Quad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New York, 1977

本书根据纽约“夸德伦格尔”/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77年版译出

七大洲风云四十年

——回忆录萃编

上册

〔美〕赛·利·苏兹贝格 著

蒋敬、米瑞恒、梁再宏、龙校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 1/2 字数343,000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3

统一书号: 11072·47

定 价: 1.45 元

51877

出版说明

《七大洲风云四十年》于1977年在美国出版，作者赛勒斯·利奥·苏兹贝格是当代著名的美国资产阶级专栏作家。苏兹贝格生于191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33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叔父主办的《纽约时报》聘用了他，几十年来他在世界各国进行新闻采访活动，足迹遍及七大洲，撰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和评论文章。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许多专栏文章曾由美国 and 国外数百家报纸广泛转载。迄今他写过十七部著作。

苏兹贝格在本书中以日记体裁扼要地记述了他在四十年新闻采访活动中的主要见闻，其中包括国际舞台上许多首脑人物和外交家同他直接接触时所提供的大量背景材料和一些“内幕新闻”。这四十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大战时期和战后的年代，是一个世界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从作者的采访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各国（这是作者的主要活动范围）的头面人物及其谋臣策士们对于国际形势及许多国际争端的种种看法（其中也包括一些对我国的攻击）。这些，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具有比较重要的资料价值和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共分三十章，原著未设标题。译本分上下两册出版，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在目录上标明了每章的起讫时间。

译者在翻译中对涉及我国的某些地方作了少量删节。

1978年12月

前 言

这是最后的恐龙的一本书——恐龙这一物种，据作者说已经变得毫无用处了。不过，说得更确切一点，恐龙还是在行将灭绝的过程中，因为报刊还没有消亡。但是，到了报界再也不能促使产生这样一类的书籍的时候，人们倒要渴念它们了。

这本书的产生需要才华和幸运二者的结合。首要的是，作者是一家有声望的报纸的享有特权的记者。这就使他有可能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当亚洲第一个解放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①去世后不久，就能够出访土耳其，而在过了许多年以后，最近又能同周恩来晤谈。在苏兹贝格去安卡拉的时候，大多数人依然记得奥斯曼帝国曾是世界列强之一，英帝国仍然是一个世界强国，而中国则还没有恢复它的元气。

至于本书的内容，首先，使我惊奇的是，他所描绘的人物，不管是我所认识的还是我从未见过的，竟都是如此的相似。这可否归之于他的写作天才的本性，还是归之于他的着眼点的特色呢？

其次，所有这些国家首脑，同样地讲的都是“该对美国公

^①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Kemal Atatürk, 1881—1938)，1919年凯末尔领导了土耳其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奥斯曼王朝。1923年正式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译者

众讲的东西”。他们同这位传播者（苏兹贝格）和看不见的听众（公众）的这种相似性，在五十年内都将引起人们的深思。

本·古里安是一个例外。苏兹贝格给他作的画像真是杰作，而这个模特儿本身也确实出色。他那时已不再执政。同样，请看丘吉尔那头野猪，再也没有比苏兹贝格为他所作的画像更精采的了。

他和我都出版分卷的书，朋友们把它们当作单本的书来读。当然它们都只不过是一些章节。书只有一本，那就是全部著作。苏兹贝格的著作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他的事业的成功之处。他自己却藏身幕后，半隐半现，宛如古代佛兰芒名画^①的捐赠者一样。

最后一点，就是作者的时代；这是本书的灵魂所在。作者在听到最后几辆双轮马车辘辘而过的声音之后，又赶上了在电视上观看宇宙飞行员从他的祖国飞登月球。还有哪一代人曾经目击过这样急剧的变迁呢？除了一些灾祸以外，这样的剧变是史无前例的。

也许，有些罗马人看到过古罗马的陷落；也许，在黑死病瘟疫中幸存下来的与佩里克勒斯^②同时代的雅典人，目睹过雅典城邦的灭亡。诚然，昔日征服者时代的冒险性是光彩夺目的，但帝王的更迭毕竟是比较简单的事。假如拉美西斯二世^③在天

① 佛兰芒名画（Flemish Paintings），著名的欧洲古典画派，油画先驱，尤其是在十六世纪，杰出的画家辈出，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译者

② 佩里克勒斯（Pericles，公元前495—429），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政治家，民众领袖和演说家，曾进行一些民主的改革。——译者

③ 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公元前约1317—1251），古埃及王。——译者

堂里和拿破仑相逢，彼此可以谈谈军事、财政，也许还可以谈谈宗教。他们是同行。可是，在这个世纪里，人类对许多事物的改变，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对于把这个时代同以往所有那些时代——农业帝国和商业帝国时代——相区分的东西，我们还没有能够找到一个确切的名称：那是人和他周围生活的相互关系的根本改变。

历史学家已经阐明，各种文化之间有着极其相似之处。氏族社会发展成为帝国，然后又循着相似的历史轨迹走向衰落。但是，即使古埃及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是平行发展的，即使这些文化的发展都促使了世界性大都市的形成，可是亚历山大城^①和拜占庭^②之间的类同，决不能推导出拜占庭的命运和纽约的命运的相似。因为我们这一代的文明不仅第一次理解了历史，而且也第一次理解了机器。不论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人类和机器的对话同样都是奇妙的。

我们的时代至少存在着三个特征：科学、机器和历史，这三者的结合是人类过去所未看到过的；而这历史所不断追求的目标，就是要使人类的冒险活动成为可以理解的，要使科学不但受理性主义以前的旧观念的束缚，也不受启蒙时代和十九世纪理性主义的束缚。

过去四个多世纪，这个星球的历史和殖民化是纠结在一起的。但是，在1947年，印度获得了独立。1949年，毛泽东进了

① 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埃及港口城市，相传公元前331年为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所建。——译者

② 拜占庭 (Byzantium)，公元330年前的古城名，东罗马首都，现在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译者

北京。过去，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白种人权力的扩展是个稳定的进程，因为他们可以远远追溯到海上霸权时代，当时他们的炮舰震撼了许多帝国。然而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的时候，就如同一个阿富汗商人从美洲发了财回到喀布尔一样；在各大王国争雄的时期，彼此之间究竟谁占军事优势是很难有把握的，所以路易十四小心翼翼，不敢轻易向土耳其帝国宣战，但是自从横帆船时代初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人一贯的想法是：“是我们发现了所有其他的人，而谁也不曾发现过我们。”假如1900年的英国人能够读到现在这本书中的采访记录，看到二十世纪又出现了世界社会多元化，他一定会惊讶不已。

尼采^①曾经预言，这个世纪将是个各民族的世纪。可是民族这个概念却是从西方输出的，而不是从汉朝发掘出来的。现在亚洲和非洲终于都获得了解放，可是世界范围的价值标准，有哪一种是在欧洲以外产生的呢？当然，在1900年常读吉卜林^②著作的英国人也许会注意到，诺贝尔奖金发给了印度的化学家、中国的核物理学家以及日本的癌症研究人员。然而今天的世界却仍然由于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这样的欧洲人所给予的冲力而动荡不已。我听到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辛酸地重复着尼赫鲁对我说过的、在本书中也屡屡出现的一句话：第三世界只有用西方的技术才能战胜贫困。二十年之后，黑人的雕刻艺术也许会从黑人区里冲决而出；但是，在目前，象地狱之火那样或者象宗教

① 尼采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译者

② 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作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鼓吹者。——译者

那样席卷全球的唯一非西方的产物就是爵士音乐——这是一种无国界的神奇力量，它来源于黑人世界。

我们也许能够教人家怎样治病，怎样选举，可是，却不能教人家怎样生活。实际上，我们难道曾经这样试过吗？殖民化并不是教给人们怎样去生活。中国的意识形态来自欧洲，但是中国的生活方式却并不来自欧洲。在本书作者曾描述其变化的每一座城市里，都矗立着我们输出的摩天大楼，但它们就象是些空架子。我们在亚洲寻求意识形态。我们迷惘地期待着印度的玄学，可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又怎么样了？在物质方面我们是强大的，但在精神方面我们却是无能为力的。我曾写过：我们的文明可能使我们能够第一个征服月球，而到那里去自杀。作者同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们的谈话，向我们表明了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什么；这本书大概可以清楚地揭示出这些领袖们全都未能求得的东西——但那只是对后世的读者而言。

从美国独立战争到英国统治印度这一段时期，缺少这样的一本书作出历史的见证，我们可以对此感到遗憾。但是我们不能当真作这样的设想。因为在发明电报之前，是不可能产生这样一本书的，没有电报就不存在现代的报纸；其次，客运飞机对本书作者来说也是重要的。他这样的书以后也不会再有，因为直观传播工具正在急剧地改变我们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还有人充当那个时代同其历史人物之间的中介人，那他就不会是个了不起的新闻记者。因此，人们要想读一读一个世纪同它的政治领袖们之间的对话，那就只能研究这一本书了。

从作者同一些截然不同的人物的谈话之中，可以发现有一种奇特的家族式的相象。这一点是否会对将来的读者引起跟我

们一样的兴趣？如果一本影集里的照片彼此相似，人们就认为这是摄影师的风格。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时代的风格，才使那些照片看来相似。采访记者要提出的问题，一般说来是概括了他的读者们所要提的问题，从一些趣味性的题目以至政治信仰问题。如果被采访的人遇到刨根究底的追问，那又会怎样呢？例如赫·乔·威尔斯^①在向列宁和斯大林提问时，就是这种情况。可是他们两人的回答却并无二致。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两人采取了同样的遁词。那么，这些谈话中的共同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位被采访的领袖是在向谁回答问题呢？他并不是在回答提问者，而是在回答他称之为历史的想象中的观众。他试图使公众舆论相信，也就是为了使历史相信。

相信些什么呢？

本书作者凭着多年来同如此众多的领袖人物交往的经验，使他能够想象出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俾斯麦、拿破仑、腓特烈二世、彼得大帝或叶卡捷琳娜女皇、克伦威尔或杰斐逊等会晤的情景。同拿破仑的会晤也许是容易的，只要把他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中所述说的内容概括一下就行了；他那本回忆录也许是为了指导他的儿子，而不是为了指导后世而写的。但是想象中的会晤场面将会象个人独白一样地结束。只有想象中的跟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谈话听上去似乎还象点样，因为当时历史上的女伟人确实存在，而新闻记者却是不存在的。当这位女皇同狄德罗^②谈话时，她尽管有所提防，但还不是用提防采

^① 赫·乔·威尔斯 (H.G.Wells, 1866—1946)，英国小说家兼历史学家。——译者

^② 狄德罗 (Denis Diderot, 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首领。——译者

访记者的那种方式。

如果听众及其当时的历史形象都没有变化的话，采访一下古人还是可行的。但是凯撒是越过他的听众及其后代的理解能力而直接向罗马时代特有的历史观讲话的。当时这位皇帝为了激励士卒作长篇训话，大声疾呼，以剑裂袍^①那种戏剧性的表演是完全必要的（正如他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们所做的一样）。现在的国家元首同一位名记者的谈话跟这种长篇演讲有类似之处，因为今天守护着我们的历史形象是以报刊作为象征，正如古罗马的历史形象是以军队作为象征一样。一期报纸把一天的情况变成新闻，并且使它构成一个幻想的世界，而这个幻想世界，因为它是当作真人真事报道的，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报刊把一些事情汇集起来编织成一幅事件的网，同时又把那些被采访的人物所作的审慎谈话加进到当代的历史形象中去。这种形象将一直是象空气一样透明，直到有朝一日由于某种东西，也许是直观传播工具代替了报刊，那时候这种形象就成为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了。

在我们当代的文明生活中有一种紧迫的时间感，这是新闻报道所造成的。我们务必力求懂得，就是这种时间感使一切值得报道的事情都变成了重大事件。在过去的时代里，一位国王的逝世或一次战争的失利的消息，要在很久之后才能传到民间；在十九世纪以前，人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一些旧闻。在中世纪，时间感是带有纪念意义的。1250年的圣诞节离开圣诞节

① 古罗马将帅的长袍（toga）象征和平，撕裂长袍则象征作战。古罗马的文学家兼政治家西塞罗的名句：“武器让位于长袍”（Cedant arma togae），即要求和平之意。皇帝出师时，督励士卒，撕裂长袍，表示破釜沉舟，决心一战。

——译者

生日反而比离开1250年12月24日更近些。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更加重视当天早晨的报纸而不去重视其他任何一期扔在一边的旧报纸呢？然而人人都是这么重视的，最近的将来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因为每日的报纸与其说是为了今天还不如说是为了明天。电视的普及大大地增强了这种力量。

本书所记载的内容大都是同当代伟人的谈话，说的都是发表这些谈话时报纸上的时事问题。所以这些文章之间彼此都有内在的联系。即使不是按年代编排，或者甚至不注明日期，我们也不会把它们误认为是凯撒时代或者中世纪发生的事件。作者动笔写一篇文章之前，他总是紧密地适应着形成他这个时代的各种相互关系，时代一词在这里包含着双重意义——当代和延续期。

周恩来在他开始回答问题之前，也同样适应着这个时代的各种相互关系，因为他谈话的真正对象是报刊背后那个难以捉摸的形象，也就是当代时事的形象。所有当代国家首脑都是为了这个形象的利益而说话，而拿破仑当时则是为了他自己罗马式的崇高形象而说话。我们这位恐龙在他整个一生中亲耳听到了世界领袖们所共有的那些思想观点；因此，这本书是无与伦比的。

我们希望能够在想象中采访过去的那些领袖人物，用爱克斯光对他们透视，揭露出诸如叶卡捷琳娜女皇或查理五世等所明示或者暗喻的最高价值。例如，拿破仑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在古罗马，国家和阶级具有超自然的价值，因为主宰它们命运的是守护神。但是罗马时代没有报纸，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价值却是时事新闻。再者，我们现在再也不能忽视新闻中所提出的问题，在我们之前的文明时代。对于文明的渊源极其重

视；而我们这个世纪却第一次成为以新闻作为守护神的世纪。

在俄国历史上，争夺沙皇宝座的时期被称作“扰攘时代”。你现在即将读到当代巨人们喧嚷的声音的汇合。难道这本书只不过是记述西方强权意志及其在第三世界的仿效者的一部编年史吗？也许，这种喧嚷的声音是对今天精神世界的恐龙们发出的警告：在殖民主义征服的时代之后，第一个全世界范围的扰攘时代就要来临？

安德烈·马尔罗

目 录

第一章	1938年	——1940年	1
第二章	1941年初	——1944年 6 月	32
第三章	1944年 9 月	——1946年12月	66
第四章	1947年 1 月	——1949年 1 月	101
第五章	1949年 2 月	——1950年 6 月	129
第六章	1950年11月	——1951年 7 月	161
第七章	1951年 7 月	——1952年 5 月	186
第八章	1952年 7 月	——1953年 2 月	212
第九章	1953年 3 月	——1954年 4 月	232
第十章	1954年 4 月	——1955年 4 月	263
第十一章	1955年 5 月	——1956年 3 月	298
第十二章	1956年 4 月	——1957年 1 月	336
第十三章	1957年 1 月	——1958年 5 月	374
第十四章	1958年 5 月	——1959年12月	410
第十五章	1959年12月	——1961年 4 月	450

第 一 章

1938年10月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两国替自己铺设了一条阴暗的道路走向衰落。在慕尼黑协定之前，我活动的基地一直是在伦敦。关于法西斯主义，我听到的是够多的了，但是还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恐怖，于是决定去观察一下它那骇人听闻的实验场。我选择了奥地利。《北美报业联盟》发给我证书，同意接受稿件，比弗布鲁克勋爵办的《伦敦旗帜晚报》也约我当供稿通讯员。

我办好了去维也纳和布拉格的签证和票。然后我拜访了扬·马萨里克，他是捷克第一任总统的儿子，驻伦敦公使，未来的外交部长。他经常向我提出明智的忠告。这样一个好人，后来成为1948年共产党政变中的牺牲者。官方的消息说，当秘密警察来光顾他的时候，他从切尔宁宫中自己的房间里跳楼身亡。我有理由相信，这不会是自杀。

他交给我几封信，其中一封是给贝奈斯总统的，我便启程前往维也纳。那座城市已经降为省城，是纳粹德国东马尔克的省会。在维也纳我寄寓在辛格大街的一家旅馆里，旅馆老板向我喊“海尔希特勒”^①，还用那种纳粹分子想象为罗马式的姿

^① 即“希特勒万岁”，原文为德文。——译者

势行礼。招贴广告上印着纳粹元首的像，图书馆里尽是他的著作或颂扬他的书籍。大多数商店都挂着牌子，上面写着“雅利安人的商店”，或者“这个犹太人已在达豪^①，”或者“这个犹太人就该在达豪”。我来到圣·斯蒂芬大教堂，看见一个穿制服的男人从台阶上扯住一个年轻妇女，拖着她往前走，一群人跟在后面起哄。教堂里面许多人正在默默祈祷。

在这座世界闻名的古城里，笼罩着一种难受的气氛，就象在兽笼和停尸场里一般。我后来听许多人谈到奥地利人风度潇洒，怡然可亲，我确实也常常遇到过；可是在这些日子里，是一点影子也没有的。作为一个犹太人，我感到忿怒；作为一个人，我感到厌恶。

在当时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为古怪的是一个美国记者，名叫罗伯特·贝斯特，是一个悲剧型的怪人，后来成了叛徒。战4 后他被逮捕，判了刑关进联邦监狱。1952年死在狱中。但是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很肯帮忙、机智、勇敢。在维也纳他也是个体面人物。他有两个最密切的同伙：一个是女秘书，一个是情妇。女秘书曾因谋杀丈夫罪受审，她凭着她那双美丽的大腿在法庭上占了上风，并使那个多情善感的陪审团判她无罪。以后，她写过回忆录，又成了个新闻记者。他的情妇是个奥地利贵族，可能是她引诱贝斯特吸毒的。由于爱她，在珍珠港事件后双方交互遣返平民的时候，他决定不回美国，倒反成了一个纳粹的宣传家。

贝斯特帮我安排了我一生中最难受的一段经历。他找到了

① 达豪（Dachau）——是德国法西斯占领奥地利后，在维也纳郊区设立的犹太人集中营。——译者

一个污吏，通过他向该城停尸所犹太分所的看管人行贿，才让我独自到那里去查阅记录。一天晚上，晚餐后我乘有轨电车到了中央公墓，进了大门，碰到一个黑衣黑帽的小矮个男人。他有两天没刮胡子了，嘴里一股葱臭。他收下了一个装着钱的信封，就领着我穿过一座楼到了一个长长的房间，慌张地把门关闭。那卡搭一声的锁门声，至今依然在我耳际回响。

由于事先警告过不许点灯，我从衣袋里掏出了手电筒，环视四周。在一张大办公桌上我找到了两本名册，里面是手抄的登记表，写着停尸所里每一具尸首的姓名、死亡日期和原因。再过一道拱形门，到了一间长方形的厅堂，许多桌子上平放着一些东西，蒙着布单，轮廓依稀可辨。我按照布单上别着的编号察看了其中的五具尸体，然后同名册上的登记表互相对照。按记录，五个人都是自杀的。其中三个很难判断名册上的鉴定是否正确。其他两个，掀开布单一看，显然，无论怎么说也是打死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自杀会把自己的眼睛敲出来。

我用手电照见三面靠墙都是架子，就象是图书馆里的书架。架子上放着一排排黑色罐子，样子象是炮弹头，只是把弹尖锯平了，这样倒过头来才可以放得稳。罐子特别轻，象是用塑料做的。我检查了几个。在铁皮盖上冲印着姓名和日期，例如：“No.1732. Städt Bestattungsamt München. Frank, Fritz.Hochschüler.5.7.11 Wien 14.1.38 Dachau.F.B. 4.6.1938.” 翻译出来，这些字的意思是：学生弗里茨·弗兰克，1911年7月5日生于维也纳，二十七年后卒于达豪，给予公葬（意思是火化）。我把装骨灰的罐子放回，只听到轻微的沙声，经过科学方法处理后，一个人的身体就变得这样轻了，这使我感到震惊。